

YANGFUQUAN
NAXIXUEJUNJI

纳西学论集



杨福泉

白庚胜 和自兴◇主编

纳西学丛书

杨福泉◇著

民族出版社

纳西学丛书

白庚胜 和自兴◇主编

和仕勇◇执行主编

杨福泉◇著

YANGFUQUANNAXIXUELUNJI

纳西学论集



杨福泉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杨福泉纳西学论集/杨福泉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9.7

(纳西学丛书/白庚胜, 和自兴主编)

ISBN 978 - 7 - 105 - 10165 - 8

I. 杨… II. 杨… III. 纳西族—民族文化—中国—
文集 IV. K285.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16136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mzcbs.com>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17.25 字数: 445 千字

定价: 48.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10165 - 8/K · 1833 (汉 992)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总编室电话: 010 - 64271909

发行部电话: 010 - 64211734

致力于纳西学的崛起(代序)

白庚胜

两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一位朋友在看到我的小文《纳西学发凡》后,决定将它投稿于该所一本相关专业杂志发表。谁知该杂志的一位“权威”竟说什么“纳西学何有之?”听到这一信息反馈,我心怅然,既忿然于这位权威之傲慢,同时也感慨纳西学学科建设之迟滞。

感愤之余,我并没有停止思考与行动。在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调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及分党组书记后,我利用工作之余穿行于首都北京与全国各地,尤其是昆明、丽江、迪庆等地纳西学学者及纳西族官员、实业家之间,决定组织一套纳西学丛书。在我的设计中,这套丛书包括30部国内外较有影响的纳西学学者的学术专集。

正如广大读者将从这套丛书中了解到的那样,纳西学的发展历程艰难备至。它的起步一般可以锁定在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初。那时的纳西学以西方学者、传教士、军事人员游历纳西族地区,并收藏东巴经典,翻译有关文献片断,发表有关介绍文章为主要特点;从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末,纳西学粗具规模,刘半农、董作宾、李霖灿、陶云逵、罗常培等内地学者开始关注纳西族历史、语言、文字研究,纳西族学者杨仲鸿、方国瑜、赵银

棠亦接踵于后,进行多领域的探索。无论是其田野调查、文物收藏,还是专题性的研究都成果迭出。在国外学者中,被誉为“西方纳西学之父”的洛克以独居纳西族地区 28 年的传奇经历,以丰富的纳西文物收藏与传播,以深刻而全面的纳西文化诠释,在纳西学领域渐入佳境;从新中国成立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洛克在国际纳西学界独领风骚,并影响、育成了欧、美、日等国的一批纳西学新秀。这一时期,与之失去联系的我国纳西学界仍在踽踽前行,和志武、周汝诚、和发源等先生成为传递薪火的骨干力量;60 年代至 70 年代末,尽管仍有雅纳特、杰克逊等人活跃于学界,但一代宗师洛克的去世使西方纳西学跌入低谷,国内的纳西学更是遭受浩劫,纳西文化生态遭受全面破坏,这是纳西学的全球性低迷时期;从 80 年代初至 21 世纪初年。纳西学进入全面复兴时期,《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的翻译出版、国际纳西学学会的成立、国际东巴文化艺术学术研讨会的举办等盛事都集中出现于这一时期。

对纳西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这一问题,我已在《纳西学发凡》一文中作过这样的表述:“纳西学,就是以纳西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在实践上,它贯穿古今;在空间上,它横跨东西。它既包括对纳西族的本体性研究,也包含这种研究本身。就前者而言,有关纳西族的生存环境、存在历史、生活方式、精神信仰、组织制度、艺术创造、技术成就等都无不纳入其视野之中;就后者而言,有关纳西族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学者与成果、历史与活动、机构与组织都囊括于其内。”对于这一判断,我至今认为比较科学、正确,它同时也被学术界所接受。因此,编纂这套纳西学丛书的冲动之一,就是为了进一步为纳西学立名、正名,并全面、系统地展示纳西学的内涵。当然,这只是就目前的情况而言,继续丰富、发展它的

使命已经历史性地落在后来学者的肩上。

当这套丛书即将问世之际,纳西族社会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方面,固守万古的民族保守性已经被击破,发达的交通已突破铁甲山的阻绝、金沙江的割断,使“丽江口袋底”的神话不再;快捷的通讯将古麽些人的后裔编织进全球现代信息网络之中,靠古老的象形文字及口传心授维持独立的知识系统已难以为继;农民转变为市民、乡村开发成城市的社会转型风驰电掣;以追求超额利润为目的的一库八站建设将一改玉壁金川的原生形态;每年400万的游客正在改变着丽江的一切;不断变化的行政区划,使纳西族的生存空间从汉时的六江流域退居三江并流区,继而兰州立县、拖支并维、迪怒建州、行署改市、丽江县裂身为二。从自然到社会分错杂然,到处都在发生急剧变化;由社会进而至主体光怪陆离,一切都在解构与重组。这便是纳西学今天所面对的现实,这也是纳西学学科的生长点。或许过于苛刻,但纳西学必须回答纳西文化生死存亡的问题,决不能陶醉于古乐、古城、古文字带来的荣耀,更不能沉迷于现代社会的犬马声色、“安乐死亡”。

纳西族社会的阵痛或许正是纳西学的荣幸。阵痛,所以产生刺激,有了问题意识;阵痛,所以有新的思想诞生,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已经走过的历史岁月里,纳西学已经产生《麽些研究》、《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英语——纳西语百科辞典》、《被遗忘的王国》、《纳西族象形文字谱》、《活着的象形文字》、《纳西族史》、《纳西族文学史》、《麽些研究论文集》、《东巴神话研究》等标志性成果,产生了巴克、洛克、雅纳特、山田胜美、君岛久子、西田龙雄、方国瑜、李霖灿、和志武、郭大烈等大家,涌现出戈阿干、杨世光、和钟

华、李国文、王元鹿、詹承绪、王承权、刘龙初、喻遂生、杨焕典、伊藤清司、林向萧、王超鹰、蔡华、杨福泉、和少英、拉木·嘎吐萨、李近春、白西林、杨德鋈、余嘉华、諏访哲郎、和发源、木丽春、杨正文、李静生、王世英、李锡、李海伦、杨海涛、陈烈、赵心愚、白郎、和力民、习煜华、李丽芬、和宝林、和庆元、和云峰、和品正、牛耕勤、木基元、木仕华、周智生、冯莉、孟彻理、生明庆二、斋滕达次郎、村井幸信、荒尾丰、黑泽直道、杨杰宏等学者，成立了国际纳西学学会这样的组织，创办了《国际纳西学学会通讯》这样的杂志，出版了《纳西东巴古籍译著全集》这样的经典，举办了国际纳西文化艺术学术研讨会这样的会议。由此我们也可以坚信：未来的纳西学将在更广的学术视野、更细的专业分工、更大的学科综合、更细的理论分析、更多的民族与国家参与、更先进的科技手段利用的基础上得到发展、得到推进，并产生新的学术成果，推出新的学术代表人物，创造出新的学术辉煌。

学术需要积累，学科也需要积累。既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骄狂自大，且让我们都来做纳西学的积累工作。纳西学存在的证明只能是实力：实实在在的队伍，实实在在的成果，实实在在的资料，实实在在的工作。

按照丽江市委书记和自兴同志与我确定的原则，这套纳西学丛书就其作者而言，不分中外，不别纳汉，凡在纳西文化研究中成就突出者均在入选行列；就其范围来说，除文学创作以外的纳西学论文、评论、调查报告、译文都择优辑入；就其目的来说，完全是为了对纳西文化研究进行梳理，结构纳西学的框架，提炼纳西学的方法，唤醒纳西学学科建设的自觉，确立纳西学的主体。

组织出版这样一套丛书，显然需要多方面的支持，尤其需要纳

西族学术界的参与。有幸的是,我的初衷得到了同仁们的响应,更得到丽江市古城管理局及其局长和仕勇的襄助。最难忘的是得到民族出版社及罗焰女士的帮助,得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旅游文化专业委员会李有生秘书长、李莉副秘书长的慷慨扶持。“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真理又一次得到证明。

我坚信,总有一天,纳西学必将成为与藏学、蒙古学等学科并驾齐驱的显学,我的后继者将不必再为“权威们”怀疑纳西学的存在而备感屈辱。到那一天,纳西学将不再是一个模糊的存在,它的文字、训诂、语言、文学、哲学、历史、地理、宗教、军事、辞书、艺术、社会、医药、天文、技术、生态、民俗等分支学科都将一一形成,并向更深入、更细致的层次发展。

2006年5月13日于北京寓所

略述我的治学经历 1

东巴文化

纳西族东巴经中的“黑”、“白”观念探讨 9

略论纳西族东巴教中的箭 22

敦煌吐蕃文书《马匹仪轨作用的起源》

与东巴经《献冥马》的比较研究 38

纳西族人猴婚配神话刍议 58

论纳西族生命神“素” 65

纳西族的灵魂观 76

纳西族木石崇拜文化论 88

纳西族的“青蛙五行”与生命观 103

从《神路图》看藏族宗教对东巴教

的影响 116

论唐代吐蕃苯教对东巴教的影响 133

东巴教与苯教之初步比较研究 147

论纳西族巫师“桑尼”(桑帕) 167

东巴教所反映的生殖崇拜文化探讨 181

论东巴教中的生命树与死亡树 197

东巴经殉情长诗《鲁般鲁饶》刍论 210

论少数民族本土文化传人的培养
——以纳西族的东巴为个案 225

略论东巴教的本土神祇谱系 238

纳西族“东巴”和“本补”称谓考辨 255

历史·社会

纳木依与“纳”族群之关系考略 282

纳西族的崇尚勇武精神及其源流探索 298

“改土归流”中的“以夏变夷”

对纳西族社会的影响 314

论唐代吐蕃与麽些的关系 335

明代治藏政策对纳藏关系的影响 348

略论纳西族和藏族的历史关系 367

论丽江古城纳西文化和汉文化的相互影响
与整合 381

西方纳西学研究述评 397

民俗·文学

纳西族“山中灵界”观及其演变 411

略论纳西族的生死观 433

纳西族的“生命三段论” 443

藏族、纳西族的人与自然观以及神山崇拜

的初步比较研究 460

论纳西族长诗《游悲》 470

政治制度变迁与纳西族的殉情 482

丽江纳西族的社区资源管理传统 494

论纳西族的传统生育礼俗 507

杨福泉纳西学主要论文和著作目录 521

后 记 537

略述我的治学经历

我1955年9月17日生于丽江古城一个纳西族家庭，在丽江大研古城兴仁小学（现兴仁方国瑜小学）读小学，丽江一中（现丽江市一中）就读中学，然后上山下乡当了两年的“知青”，继而在丽江汽车运输总站当了一年的工人和一年的宣传干事。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我考上了云南大学中文系，因自己爱好文学，就读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大学期间，看书日多，眼界渐宽，渐渐沉湎于诸多自己原来不知的知识中，对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和纳西学等逐渐产生浓厚的兴趣，除了选修文字学、语言学、宗教学、民俗学、民间文学等课程外，还登门向云南大学纳西族著名学者方国瑜、和志武先生求教，学习纳西族东巴象形文字、纳西族历史、纳西拼音文字、国际音标等。1980年曾作为这两位前辈学人的助手，协助当时来云南大学进行有关纳西学学术交流的德国（西德）学者雅纳特（Janert, K. L.）教授工作了半个月，和他一起研究纳西语，用国际音标纪录纳西民间故事等。雅纳特教授在1961—1962年期间曾是应邀到前西德进行纳西文献编目和研究的洛克（Rock, J. F.）博士的助手，1962年洛克逝世后，雅纳特教授继续从事纳西文献研究。和他的这次初步合作，促成我日后到德国进行纳西学研究的契机。

读大学期间，我利用假期回乡做过一些社会调查，完成了毕业论文《纳西族的古典神话与古代家庭》，还写了《论纳西族（殉情）长诗“游悲”》、《纳西族人猴婚配神话刍议》等文章，

这几篇论文后来在学术名刊《思想战线》、《民间文学论坛》以及民间文学刊物《山茶》上先后发表了，这算是自己学术生涯的开始吧。

1982年1月大学毕业后，我在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工作了一年，有机会跑了云南的不少地方，增长了不少见识。1983年1月，我获得德国（前西德）国家科学基金会（DFG）学术基金，应雅纳特教授之邀，到德国科隆大学与他进行合作研究，1985年1月返国，在1986年3月至1988年3月又再度赴德国科隆，完成了“德国亚洲研究文丛”第七种《纳西研究》系列著作4种，《光明日报》、《中国日报》等曾对此作了相关报道，评说“中国改革开放后云南第一个走出国门与西方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并取得丰硕成果的少数民族学者”。

在德国的4年治学岁月中，我深深地感到，一个从事民族学研究的学者的根和生命是在自己的故土，他的使命也应该扎根在故土，与故土休戚与共。因此，我无心恋异国繁华，回到母亲怀抱，开始了我走向田野进行民族学、纳西学研究的漫漫治学路。我后来成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后，又在职攻读了云南大学的历史学博士学位。

到2007年，我从事民族学研究已经23个年头。在这23年的学术生涯中，我从事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个中对纳西学所下的功夫最多。多年来，我跋山涉水，漫游于高山深峡、山村农舍，深入纳西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走遍了纳西族的主要聚居区丽江县的大部分乡镇，也多次深入到迪庆州的纳西族地区、四川省的纳人居住区以及西藏昌都芒康县盐井纳西族乡进行田野调查，获得了不少第一手资料。这些深入山野村寨的田野调查使我获益匪浅，如果没有这十多年的田野调查，我就不能写出如今已经问世的这些著作和论文，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没有这样长期的田野调查，我也不可能对纳西族社会、历史、文化和当代变迁有

比较深刻的认识。

迄今，我在国内外已经出版了 24 部专著，在《民族研究》、《世界宗教研究》、《新华文摘》等学术刊物上发表了 140 多篇论文。其中 10 多种论著在美国、英国、德国、荷兰、印度、泰国等国著名的学术刊物和学术论集中发表，如我 1988 年在德国波恩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专著《现代纳西文稿语法分析和翻译》第一卷；1999 年，我和加拿大魁北克大学教授汉尼（Feuer Hanny）合作，在半年的田野调查基础上写成的长篇学术论文《云南藏族和纳西族的问候语研究》在国际著名的学术刊物《藏缅语研究》（美国伯克利大学主办）上发表。此外，我先后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国、英国、德国、瑞士、荷兰、印度、泰国等国学术刊物和学术论集中发表了一些论文。

我的不少著作还多次再版、重印或翻译成英文，在中国内地和港台地区以及国外都产生了一些影响，如专著《神奇的殉情》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后，又在台湾珠海出版公司出版，并被国外著名的社会性别学专家、亚洲理工学院教授高文（Govind, K.）博士组织翻译成英文。

此外，我还花了很大功夫，翻译了一些国外纳西学论著。主持审校和重译了（部分）美籍奥地利学者洛克博士研究纳西族的重要代表作《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组织翻译了当代国外纳西学名著《纳西、麽些（摩梭）民族志》（Naxi and Moso Ethnography）。

除了纳西学，我还从事其他方面的专题研究。我的民俗学专著《灶与灶神》，是对中国的灶神信仰进行系统梳理和全面研究的一本专著，在学苑出版社出版后，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很快重印，1996 年在台湾汉扬出版社出版，2000 年在台湾云龙出版社出版。

我主笔的《火塘文化录》是《灶神研究》的姐妹篇，此书从民俗、社会结构、宗教信仰等方面首次对过去无人论及的中国

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火塘文化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论析，应该算是一本以小见大的拓荒创新之作。《中国社会科学》曾发表了对该书的书评。由于此书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好评，曾两次重印，并于2000年再版。该书还在1999年被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译成英文。此专题系列论文之一《论火神》被《新华文摘》转载，并入选由中国科学院编的《中国八五科学技术优秀成果选》（1990—1995）一书中；该文亦获云南省人民政府颁发的1993—1995年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

随着读书和田野调查的深入，我治学的涉猎面逐渐拓宽，涉及语言、民族学、宗教学、历史学、文学、民俗学、旅游人类学等众多领域。我以纳西族和藏族关系史为个案，对我国学术界目前所论甚少的中国少数民族关系史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写出了38万字的专著《纳西族与藏族的历史关系研究》，对纳藏两族的历史关系作出比较系统全面、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研究。

我关于纳西族藏族的一系列比较研究文章得到学术界的重视，比如《敦煌吐蕃文书〈马匹仪轨道作用的起源〉与东巴经〈献冥马〉的比较研究》一文首次探讨东巴古籍与敦煌文献之间的联系，在中国民族学研究的最高刊物《民族研究》1999年第1期上发表后，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在国内敦煌学研究述要中，把此文作为近年来在敦煌学领域中有创见的新论，著名藏学家王尧教授把此文和《纳西族与藏族历史关系研究》中有关藏传佛教与纳藏关系的章节收入了他主编的藏学论文集《贤者新宴》，文章获得了日本世川良国际研究基金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2006年，我52万字的学术专著《纳西族文化史论》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集多年之劳的一个比较宏观的纳西学研究成果，于2007年获得第十一届云南图书奖二等奖。

我的另一本专著《走进图画象形文字的灵境》2003年出版后，又于2007年再版，并获云南省人民政府颁发的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2004年度优秀成果一等奖。

我的专著《殉情》、《魂路》、《圣山下的古国》等先后多次重印。民族学田野调查实录著作《寻找祖先的灵魂》在台湾出版，2006年又以《寻找丽江之魂——融入纳西古王国》为书名在（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了简体字本；2007年被选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广播的节目；2008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此书。

我先后主持了三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了140多篇论文其中有多篇在国内的国家级学术核心期刊《民族研究》，《世界宗教研究》、《民间文学论坛》等刊物上发表。论文《略论纳西族东巴教的多元宗教因素》，2008年被选入由中国宗教学权威专家选编、代表中国当代从事宗教学研究的老中青学者论文最高水平的《当代中国宗教研究精选丛书》。

我在20多年来的国际学术交流中也开阔了自己的学术视野，汲取了不少国外同行的治学方法和经验。1995—1996年，我获得联合国大学博士后研究基金，到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U. C. Davis）分校研究访问；多年来，我先后应邀到瑞士苏黎世大学民族学博物馆、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东方语言学系、瑞典国立远东文物博物馆、瑞典“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亚洲部、德国斯图加特巴德·伯尔科学院、瑞典伦德大学、亚洲理工学院、加拿大西门大学、美国多个大学进行学术交流。还曾经到加拿大卑斯省（British Columbia）的印第安人社区进行学术考察。2003年在美国惠特曼学院的首次“亚洲文化教育年”期间，为美国学生开设了半年的《中国西南的民族性与现代化》（Ethnicity and Modernity of Ethnic Groups of the Southwestern China）、《中国纳西族的文化艺术》（The Culture and Art of Naxi People of China）等课程，受到美国学生的好评。

此外,我主持和参与了十多项国际合作项目。从1999年到2001年,我应邀担任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TNC)与云南省政府合作实施的“滇西北大河流域保护与发展行动计划”项目的文化顾问。

除了学术研究,我看重自己作为一个民族学者与社区民众之间的那种血肉相连的情感维系和学者对社区民众的道义、良知和责任感,看重作为一个民族学者对社区民众的“回报”情结。因此,除了致力于民族文化基础理论的研究,我也积极参与关于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现实问题的研究,尽己所能为当地社区民众办实事。多年来积极推动各种国际合作的社区发展研究,长期在边远贫困地区作田野调查,与当地老百姓同吃同住,与国内外同事一起促成了丽江纳西族农村的一些合作经济实体;争取国际资金进行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人培养和乡土知识技能培训,在乡村小学里进行参与式的乡土知识教育等方面的项目,完成了“丽江纳西族民间文化传承人培养的实践和研究”、“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白沙乡白沙完小乡土知识教育的实践”、目前正在实施“少数民族妇女传统手工艺的培训”、扶助少数民族贫困学生在丽江民族中学读书等项目,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和社会影响。

由于自己在学术研究中取得的一些成绩,云南省政府在1996年授予我“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业技术人员”(一等奖)荣誉;1997年入选云南省跨世纪学术技术带头人第一层次人才;1998年,入选由国家人事部、科学技术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联合评选的“中国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才;2006年获得“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哲学社会科学专家”称号。

回首自己的学术经历,可以小结出以下特点:一是注重田野调查和“小题大做”的微观实证研究,在先做大量微观研究的基础上做宏观研究;二是注重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三是在